



第一風浪

鄧洪講述 胡曠整理



第一回浪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作者或出版信息）

第一号风浪

邓 洪讲述
胡 曠整理
姚 有 信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北京

第 一 个 风 浪

邓洪講述 胡贇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 1/32 8 5/8 印張 4 插頁

1961年9月北京第1版 196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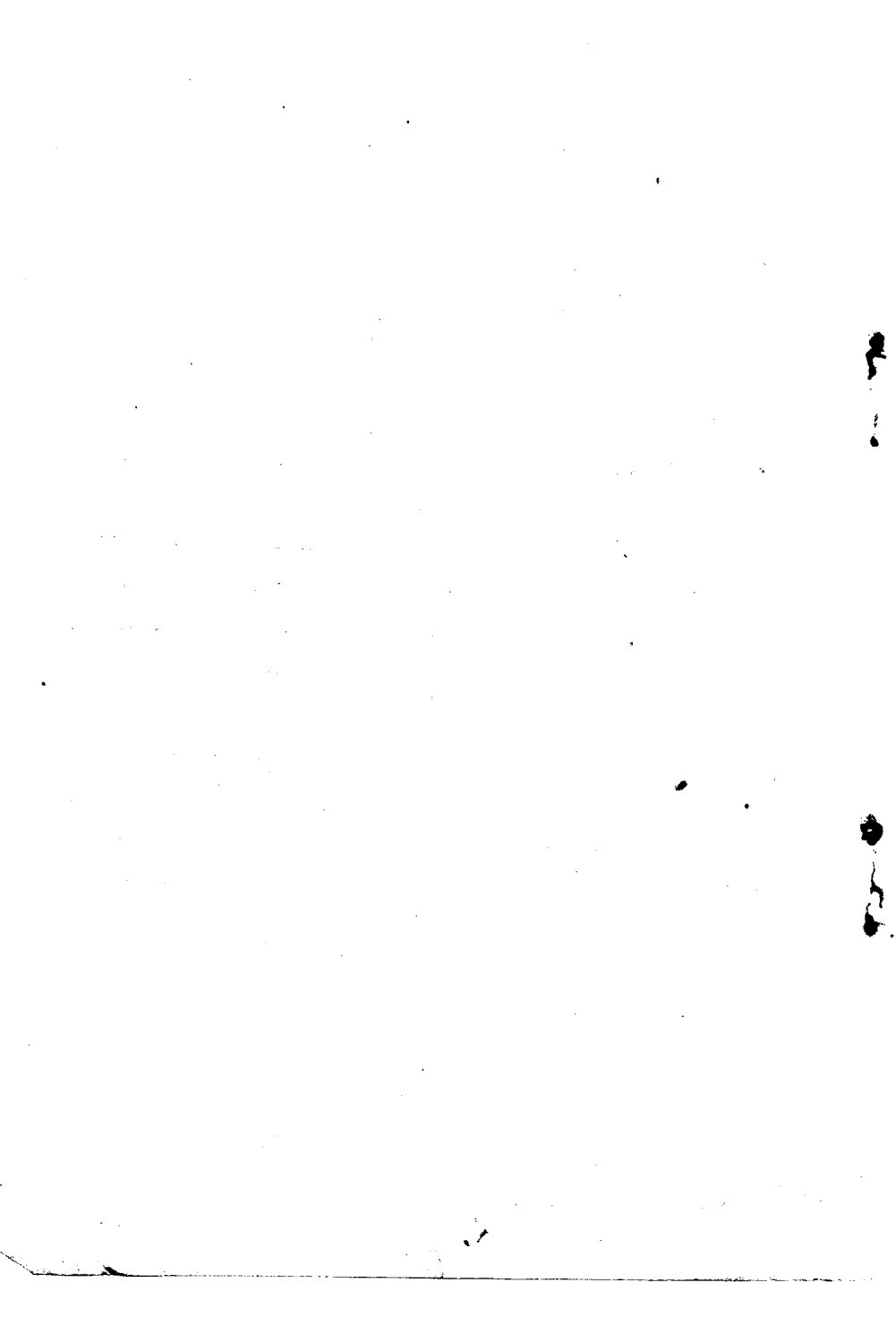
印数 1—60,000 定价 0.32元

目 次

第一个风浪	3
再生	10
潘虎	17
风雪图	29
在敌占区	36
第一次见毛主席	43
一支武装交通队	48
山中历险记	62
一件案子	82
警卫员鲁德春	88
鍾强	98

目 次

第一个风浪	3
再生	10
潘虎	17
风雪图	29
在敌占区	36
第一次见毛主席	43
一支武装交通队	48
山中历险記	62
一件案子	82
警卫員魯德春	88
鍾强	98



第一个风浪

大革命时期，我在自己家乡——浏阳县五十四乡当农民协会委员长。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长沙叛变(馬日事变)之后，五十四乡农民协会曾一度把旗子放了下来，但第二天又挂上了，而且工作更加紧张起来。紀念“五卅”的那天，五十四乡組織了几千人参加所在普迹区的示威游行。但时局越来越严重，地主、富农、流氓、紳士乘机进行扰乱，到处散播謠言，說长沙派了多少多少軍隊进攻浏阳，說某处某处搞农民协会的人都給砍了脑袋，說菩薩显灵，要收拾服从农民协会的人；还編出歌子吓唬妇女：“巴巴头，万万岁；西装头，要枪毙”，准备分田所插的牌子給拔掉了；准备修路所釘的桩子也給挖掉了……人心非常搖动，有人在发动重修被打掉了的神象，妇女們都在后脑勺上扎起假髻子来，以前有事沒事要到农民协会走走的人这时不敢迈进农民协会的門坎了，还有一些以前爱哇啦哇啦的人这时只敢側着眼睛瞟人，嘴巴却閉得紧紧地了。至于那些地主、紳士之流則是另一副神态，早些日子他們老远看見我总要設法躲开，現在却故意往我身边走，装着滿脸奸笑，

把腰弯得低低地：“呃呃，委员长，您忙哪。”

有些关心我們的人来劝我：

“再搞不得呀，风色不对呀！”

“撒手吧，人家在嘀咕着要对付你哩！”

但是我不相信革命就会这样失敗。馬日事变前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了十来天党課，懂得了关于阶级、关于剥削的問題，懂得这个世界必定要变，懂得苏联革命已經成功，因而相信只要有党在，革命就一定压制不下去；而且一定会胜利。我感謝那些关心我的人，但拒絕了他們的忠告。

大概到了六月中旬，局势愈加恶化，附近乡村、集鎮的反革命分子公开进行活动了，这里搗毁工会农会，那里抓捕革命干部，有的地方还开始了杀人。而我們这时还在准备进攻长沙。区上指示五十四乡要动员青壮年参军，还要集中所有的烏銃。反革命分子利用这机会又向农民进行煽动：“背起烏銃梭标去攻长沙？去塘炮子呵！”因之有天晚上为动员青壮年参军开群众大会时，群众都召集不攏来。三催四請，来了一些人，但滿会場嗡嗡唧唧，都各自开着小会，台上講話也沒人听。看見形势不好，我講了几句話就离开了会場，跑去找分区农民协会委员长黎梓阳請示办法。黎梓阳也拿不出主张，只說这是区上轉来县里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第二天半上午，我正在考虑如何繼續动员攻长沙的問題，区上派了两个人来催收富农鍾复初所欠的罰款，一个穿自卫队的軍装，背一支步枪，一个穿便衣。穿軍装的那个看見我时做了一下暗号，表明他是党员。我把当地情况告訴了他們，要

牠們謹慎，牠們就到鍾復初家里去了。

吃午飯的時候，一个叫陳長的農民氣急敗壞地跑來找我，“委員長呀！不得了！不得了！鍾復初牠們把兩個催款的人捆起了，把槍也繳下了！”

仿佛一個粗大的棒子在我頭上猛擊了一下似的，腦子里蟬的一聲響起來。

“人呢？”

“關在我家谷倉里。”

“鑰匙拿走了？”

“不，在我家里。槍也在我家里。牠們還到各處喊人去了。”

要來的事終於來了！現在這兩個人，我若不救牠們，就很可能要遭毒手；但我若把這兩個人放走，那麼我自己就要做“戰榮陽”里面的紀信了。怎麼辦呢？我想，分區農民協會有四支槍的自衛武裝，只有把那四支槍請來才能解決問題。于是我要陳長趕快回去，不要給人把鑰匙拿走，自己隨手抓起一把鐵尺（一種舊式武器）往腰上一插，拔腿就往分區跑。分區相隔只有一里多路，一口氣就跑到了。

不湊巧，分區的四名自衛武裝都派到外面去了，連所有的工作人員也都出去了，只有黎梓陽一個人在家。黎梓陽聽了我上氣不接下氣的匯報之後也很緊張，想想說：

“你去把牠們放掉。”

“放掉了，人家不殺我？”

“不怕，不怕，牠們不敢的。”

显然，这句话也只是壮壮我的胆而已，他也未必有什么把握。但是问题总得要解决呀！我是个共产党员，能坐视两个同志陷入虎口而不救么？不能！我要救他们！时间不容许多作考虑，我拔腿又往回跑。跑到陈长家里，打开谷仓把两个人放了出来，枪也拿来还给了他们。但这时还不能要他们走，因为走更危险，可能在路上给人杀掉。有事我来挺吧，我把他们带回农民协会。

在我开仓的时候，鍾复初已经串联好多人到路上来了。一听说我开仓放人，他就唆使流氓赖四、赖六在村子里大声嚷喊：“走呀，不愿到长沙去送死的就跟我来呀。”等我们走到农民协会，还没进屋子，就有几千人拥了上来，里一层，外一层，把我和两个催款的同志包围在坪子上，把我的铁尺也夺了，十几支雪亮的梭标挺到我身上。

“你这家伙，知死活么？”流氓赖四咬着牙齿指着我说，“死到眉毛尖上了，你还不晓得呀？”

坪子上人越聚越多，四面还在来人，脚步声，叫喊声，闹成一片。这时脑子里忽然闪过五月初间一次分谷子的大会场面。大概由于只有那次大会才比得上今天这样的热闹吧。

五月初间，夏荒开始了，许多人家没有饭吃，跑来找我：“委员长呀，怎么办啦，没有吃的啦。”“委员长呀，帮我向谁家借点谷子吧，挂了锅啦。”我一方面同情他们，一方面感到自己作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责任，于是要村里首富周梅村拿出谷子来救济饥荒。听说周梅村拿出谷子来，那些小地主、富农也纷纷拿出谷子，总起来数目相当大。那天，也在这个坪子上，

开群众大会分谷，赤貧的每家五籬，次貧的三籬。有人提議要分几籬谷子給我父亲，我坚决拒絕了，虽則我家也缺少粮食。群众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也象今天一样，里一层外一层把我围住，脚步声，叫喊声，鬧成一片。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代替群众的作法是錯誤的，但当时我没有这个認識，倒以为自己帮助了群众。而現在，時間还不过一个多月，今天上午他們也許还用那三籬五籬谷的米煮了飯吃吧，他們却端起梭标要杀我！不由的心里憤慨起来。

我圓睜两眼环視前后左右，发泄我的气愤。可是，看見围在我身边的只有十几个人，大都是流氓、地痞或与地主、富农有关系的人，其余的都离开好几步站在四周，有些人还显得很焦急，看来是在为我耽心。我想，这些人不会都是来杀我的，有些人也許还是想来帮助我吧，只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們无法伸出头来。于是我立刻想起了几句打动群众的話：

“农友们！”这是当时慣用的称謂。“你們要杀我，可以，不过要讓我講几句话。”

坪子里靜了下来。我接着說：

“自从去年九月成立农民协会以来，我没有脫过草鞋睡觉，成天成夜，跑东跑西，給农民协会做事；我没有拿农民协会一个錢的工資，沒有吃农民协会一頓飯。五月初間打土豪，谷子都分給大家，赤貧的五籬，次貧的三籬，我七十多岁的父亲沒有要一粒。我这个人，該杀么？”

我一口气說到这里停下来，拿眼睛向四周望去。有的人一接触到我的視線就低下了头，有的人好象要流眼泪，有的人

現出了忿怒的脸色，而挺在我身上的梭镖也有了摆动。于是我的胆子大了。我繼續講話，把嗓子往高处提，語調放慢：

“如果說，我对大家不起，沒有給大家多做事，該杀，那么，好，你們杀吧！”

說着，我把胸膛一挺，那些抵在我身上的梭标連忙縮了回去，生怕給我的肚子碰着了似的。于是我的胆子更大了。現在我必須抓紧时机赶快脫身。我想只有把他們帶到分区去，那里有“洋枪”，又是外村，他們是不敢胡乱来的。我說：

“这两个人是分区黎委員长叫我放的。你們要杀我，也要讓我跟黎委員长見一个面。”

这时群众里面就有人說話了：

“既然是黎委員长要他放的，那就不能怪他，我們找黎委員长去。”

好多声音附和，有人还叫把武器交还我，鉄尺就回到我手上了。于是我用手向那两个催款的同志一招，抬步就向分区走。挡在前面的群众馬上閃开一条路来，讓我走在前面，就象往常到普迹鎮上去游行一样。

到了分区，那些流氓、地痞都往后面縮。黎梓阳往台阶上一站：

“你們糊涂！县里，区上，有的是兵。你們想造反，有几个脑袋？回去！回去！委員长留下。”

賴四、賴六几个人似乎想講什么，看見群众乱了陣，就偷偷地溜了。

等那两个催款的同志說尽了感謝的話走了之后，黎梓阳

(后来叛变了)就对我說：“你不能在那地方站了，风浪来的大，你要避一避。”

看情况，我是不能再在五十四乡了。我要求留在分区，黎梓阳不肯，說分区也快站不住了，并要我快走。往哪里去呢？到处都在騷动！而且我身上只有一毛錢！好在我有修鐘表的手艺，把修鐘表的箱子提上吧。

晚上我回到家里提了箱子出来。走过五十四乡农民协会时，星光下看見农民协会的旗子还没收起，在风里展动，发出蒲拍蒲拍的响声。我走到旗子前面停了一下，默默地想：

“你撑着吧，我不久就要回来的。”

再 生

大革命失敗后，我因為當過鄉農協會的委員長，在瀏陽老家站腳不住了。陰曆五月初一的深夜，拎了一個修鐘表的小工具箱跑了出來，在醴陵的北鄉、東鄉一帶靠邊境的地區專門修鐘表。這些地方也搞過農協會，但搞的不那麼凶，所以現在反動派也不注意的那麼嚴，比較寧靜。

從去年八月搞農協會以來，大半年的時間全都是在繁劇倥傯中度過的——減租、減息呀，查田、查產呀，修橋、修路呀，禁賭、禁煙呀，開會呀，遊行呀，調解婆媳之間或者別的什麼糾紛呀……說不完的話，做不完的事，半年多沒好好吃過一頓飯，也沒好好睡過一晚覺，每天不知道天是多麼亮的，又怎麼黑的，似乎才眨一下眼睛，一天就過去了。

而現在卻剎然靜下來了，不需要高聲叫喊了，不需要疾步奔走了，不需要考慮這、考慮那、關照這、關照那了，每天只是撥撥鐘表上的小機件，跟顧客們聊聊閑天，為尋找生意而蹣跚獨行於山前水畔，多寂寞、多空虛呀！就象從驚濤駭浪中跳出來，一旦落進了闐寂無人的荒郊僻野一樣。

革命就這樣失敗了么？就這樣給鎮壓下去了么？該不會

吧？拿我們浏阳五十四乡來說，有几戶人家一年到头有飯吃？有几戶人家十冬腊月有衣穿？每年秋天，一担一担黃橙橙的谷子象百川汇海似地流进了有数的几个大谷仓，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却变成一粒一粒的金子，装入升斗小袋，伴随着农民的眼泪，回到农家的鍋台上来；要不然，就堆在那里发霉、喂麻雀！这样的天下能够长久下去么？應該长久下去么？人們睡着了，醒了，誰能叫他們再蒙起头来沉睡呢？何况我們有了組織，有了党！——想到这些，我就会全身发起热来，感觉自己很有气力。然而眼前这股旋风却是这样颳疾，四山树木都为之偃仰不宁，我这一片离了树的叶子将往哪里飘呀！——这一想，又不覺戚然。

修鐘表的时候，我常常把机件拆了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要不是別人問我为什么停下来，我也許会厮守着那些輪子、发条一劲坐下去的吧。有时还把螺絲上錯了，甚至把零件弄丢或弄坏了。最难耐的是晚上。晚上，眼睛一合上就做起梦来，夢見那些因为減了几斗租谷或几元息錢而笑得合不攏来的嘴巴，那些因为听說要分土地而頓然光亮起来的眼睛，那些因为憧憬着男女平权而走路都帶跳的輕盈步履……有时还夢見游行，全乡三更造飯，天亮開門，男女老少排成整整齐齐的行列，队伍綿亘到几里之长，旗帜翻翻，人声扰扰……这一切都是多么醉人的景象啊！每次为了要看个清楚，看个飽，我总想把眼睛张大些，再张大些。而就在这时，就在我把眼睛睜开来的那一刹那，一切都消失了！月亮靜靜地挂在天边，銀輝鋪滿半間房屋，夜，是那么寂靜、深沉！

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小学的大门，忽然門角里閃来一綫紅光，回头一看——啊！一面紅旗！一面卷着的紅旗！心里不觉怦怦地跳起来。为什么以前看到这种旗子并不怎么在意，而今天却是这样叫人感动呵！是的，我离开它太久了，二十多天了一——不，在感觉上簡直是半輩子了，一旦見面怎能不喚起久别后的怀念之情呢？我走过去輕輕地摸着它，一股热气从手心传上来，迅速传遍全身。我想起了离开家乡那天的事情。那天由于坏分子包围我而发生騷动，农民协会挂的旗子晚上也沒人收起，在夜空中随风展动。我走出家里，走过农民协会时，曾在旗子下停了一会，默念着不久要回来。現在我想，我該回去了，我該回去看看，找到关系，重新投入活动。

就在第二天的深夜，我叫开了我家的后門。

“孩子！你怎么回来啦？”老父亲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顫抖着声音問。

“我回来看看，到底怎样了。”

“哎呀，人家正要捉你呢，你还跑回来？郑炳青都給抓起来吊打了一陣，出了几十块錢才买下一条命来。要是你給抓住呀，那就不是吊打、出錢的事了，他們都知道你是入了党的。你还是走吧，現在就走！”

然而他却仍然紧紧地抓住我，仿佛怕我馬上离开他。

从父亲口里，我了解到一些地方情况：浏阳县东南西北四乡組織了“联防队”，有一支駐在附近普迹鎮，到处捕人、打人、勒索，声言要杀光所有的共产党员。区农民协会委員長黎光董跑了，跑之前把家里的祖宗牌通通劈个粉碎，表示坚决革